

江南旧闻
朱晓东

脚盆

2024年7月6日,小暑。父亲带着我女儿去弟弟的同学家钓鱼。我又一次看到了父亲那心爱的脚盆,系着绳,被风吹着漂浮在朋友家的河面上。

我心里多少有点安慰。这只脚盆是幸运的。4月21日搬家前,它的新归宿就已经确定。弟弟告诉我,他和父亲决定把它送给同学,毕竟同学家有河,可以放在河里,也可以放在家里。以后搬家,弟弟他们是无法带这个东西上楼的。

脚盆是我家的旧物,我在最早写《江南旧闻录》时,就非常详细地写过脚盆,从形制到用材用用法到储存之法:

“我所要说的脚盆,是我家的宝贝,更是父亲的宝贝,是用来打鱼的。

我记忆中的脚盆,是一只椭圆形形的木盆,高大约一尺半多,最宽处大约有一米多,长大约2米左右,可能2米多一些。底部用铁圈箍住,盆腰身上也有一圈铁箍。”

这篇文章里写箍脚盆用的是基树(方言音)或油树,基树实际上就是桫欓。日常保护,就是涂桐油。除了打鱼用,旧时家里做薯粉,还用过来过滤白薯淀粉,夏天也可以用来采菱角。理论上,脚盆可以用来洗澡,它比一般的澡盆要大,在里边洗澡,肯定很宽敞,比浴锅还宽敞。但是,我还真没听说过有用脚盆洗澡的。因为故乡乡下,冬天洗澡不会在木盆里,太冷,多在铁锅里洗;夏天,直接在码头上洗就行。

旧时故乡虽然河渠纵横,但有脚盆的人家并不多。很多人并不知道脚盆为何物,查度娘,除了我那篇《父亲的脚盆》,其余提到脚盆,其实都是普通木盆,度娘甚至连一张我说的脚盆图片都没有。

不过,我们西朱东西两村,最多时有9只脚盆,西村4只,东村5只。东西两村,父亲那只脚盆,应该是村里第二只。于我家而言,脚盆确实是我父亲的宝贝,我家的宝贝。父亲自上世纪60年代学会站脚盆,从跟着师傅捉鱼,到师傅辈老去,自己分门立户,带队捉鱼,成了周边最有名的捉鱼佬。父亲的脚盆,是我一家年现金收入的重要来源,不仅挣了家里的油盐酱醋钱,我们兄弟读书的学费,还让我们在成长的岁月,比穷困时代的一般农家孩子多了营养——捉鱼人家多鱼,也算近水楼台。很多年后,我在北京成家,岳母大人跟我说,还是小时候多吃鱼的孩子聪明。

鱼是过年必用之物,无论贫富,过年都必有鱼,所谓“年年有鱼”。故乡捉鱼的方法很多,但旧时冬天只有两种捉鱼方法,一种是干河,一种是用丝网捉鱼。在马达抽水机还不那么流行的年代,干河的成本很高,所以,并不是冬天都会干河,即使干河也不是每条都干。于是用丝网捉鱼成了冬天最主要的捉鱼方式。

用丝网捉鱼,是技术活,必须站在脚盆上下丝网(当然,在河泥船上丝网,估计也可以,但我从来没见过),于是,脚盆就成了冬天捉鱼最重要的一种工具,这就产生了用脚盆下丝网捉鱼的行业,很小众,很专业,也很有市场。自我记事起,我记得进入腊月,周边村庄专程到我家或托人



带话给我父亲,请我父亲捉鱼的人几乎没有停过。

脚盆这样的形制,空盆放在水里,看起来很正常,人一站上去,其实很难站稳,对人的腿脚功夫和平衡能力要求非常高。尤其是,冬天捉鱼时经常刮大风,河里还有残冰,加上收网后脚盆里的鱼篓,通常会有好几十斤鱼,更难平衡,一般人根本站不住。

父亲跟我回忆,他年轻时就是看着我们邻村的根法站脚盆捉鱼,就创了只脚盆,跟着根法捉鱼了。没人教他怎么站脚盆,怎么在脚盆上下丝网,他完全是自学,不过曾经落过一次水。站脚盆捉鱼的师傅,我们周边那几个捉鱼佬,似乎没有一个没有在冬天落过水。我记得堂叔落过不止一次。而我,在《父亲的脚盆》以及《1985年,高考放榜之前》里都曾写到,1985年我高考之后,和同年初中毕业的弟弟,抬着父亲的脚盆,在我们村的北大漕的大潭里练习站脚盆,以防万一没考上大学,也好学门手艺,冬天跟着父亲去捉鱼挣钱,也算是一种主动的求生欲。直到高考放榜,我小腿磕破,我和弟弟也没学会站脚盆。父亲的这门手艺,终于没了传人。父亲后来跟我说,他就是看了根法怎么站脚盆就学会了,我也是非常吃惊的。而村里跟着父亲捉鱼的叔叔们,其实也是这样学会的。可能人为了生存,没退路的时候,学起来都很快吧。

用脚盆捉鱼,除了丝网,还得有装丝网的鱼篓,同时它也用来装捉到的鱼。鱼篓里通常还有一把钩勾,非常锋利,有大鱼挣扎时,通常用它钩鱼头,把鱼拖上来。脚盆通常还有一根磨光的细竹棒,是用来挑着丝网一点点往河里下网的,俗称“咩棒”(方言音)。一根正好放进脚盆的小扁担,一根长柄鱼叉。这个鱼叉有好几米长,它是用来撑脚盆的,所以要超过一般内河的深度。同时,下好丝网后,用鱼叉击水制造动静,让鱼躁动起来,撞上丝网。

最初出去捉鱼,都是用小扁担一头挑着鱼篓,另一头挑着脚盆。脚盆可不知比鱼篓多重多少,所以得靠鱼叉压住鱼篓,非常辛苦。那个时候,父亲他们捉鱼要赶很多路。后来有了自行车,也不易,因为鱼叉柄太长。

父亲从肩挑到用自行车驮着,到最后其他人都不能捉鱼了,偶尔还有些老关系来找我。他开着电瓶三轮车,拉着脚盆、鱼篓、鱼叉去捉鱼。从带领东西两村的年轻人,到后来孤家寡人,差不多50年。

对于父亲来说,脚盆捉鱼的黄金时代,是人民公社时代。那个时候,商业不发达,街上卖鱼的也很少,河道都是生产队的,过年时社员要分鱼,只能请捉鱼佬捉鱼。对于父亲而言,那个时候,又是农闲,无活可干,正好捉鱼,一来有不错的现金收入,还有“饭鱼”(相当于今天的餐补)。而且,传统习惯是野鱼也归捉鱼佬,野鱼通常能卖出价钱来。虽然冬日站脚盆捉鱼特别辛苦,每天早上干乎乎出去,晚上湿漉漉回家,要知道那可是冬天。挣的其实都是血汗钱,一般人一想就不寒而栗,但父亲他们甘之如饴。因为,他们知道自己有对家庭的责任。

后来人民公社不再,分田到户联产承包,生产队的河道也都分了。刚开始分河,请捉鱼佬捉鱼的还很多。渐渐地,养鱼成了专业户,条件好了,也就老派的养鱼人才会找父亲他们捉鱼,父亲的捉鱼团队也就散伙了。

2013年,父亲去邻村西顾帮人捉鱼。有熟人看到后,跟我弟弟提起,这么大年纪还站脚盆捉鱼,弟弟觉得脸上无光,回家就跟父亲抱怨,说恨不得把脚盆劈了。父亲眼睛一瞪,说:“你敢。”父亲最后一次站在脚盆下丝网捉鱼,是在我们村的西浜头,时间是2014年1月23日。侄女用手机拍下了她爷爷最后一次站脚盆打鱼的照片(如图)。父亲那一年,71岁。

此后,家里的脚盆就再也没有下水,直到拆迁,被运到弟弟的同学家河里。

童年纪事
金明德

我的第一母校:广化小学

每每经过吊桥路,一幢幢粉红和桔黄色基调的漂亮校舍和上、下学时段的人山人海,总吸引着我流连忘返。大约是从人到中年开始,但凡不赶时间,我总会站在马路对面的东头村人行道上默默地望着这所学校,注视着崭新的校舍和蝴蝶般天真烂漫的小学生,眼里总会噙着泪花。

这里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所母校:常州市广化小学。

望着校门旁常州书法家周子青先生题写的刚劲有力的校名,我的思绪再次回到了65年前那金色的童年时代。

20世纪50年代后期,我家租住在广化街横兴弄内京杭大运河边的高头村(现鹏欣丽都小区所在地)。1959年夏季的某一天,已过7周岁的我怀揣户口本,在祖母和姐姐的带领下,兴高采烈地走出横兴弄口,穿过广化街,沿着对面的吊桥路向东走,过了吴家场就到了广化小学。长长的白色校园围墙上,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,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的红色大字标语映入眼帘。当时有的字尚不认识,姐姐读给我听后说这是党的教育方针。一种庄严而神圣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,从此就记在脑海里,终身不忘。

广化小学当时的校门并不在吊桥路正面街上,而是在吴家场东侧一块空地上朝西方向。校门口临时摆放着一张课桌,课桌边围满了人群。轮到我时,负责招生的老师“考了”100以下的数字加减,指认了一些简单的图文,测过视力,再问了些许家庭情况后,拍拍我的小脑袋就把名字写上了。这就完成了报名手续。

报完名,上年入学的姐姐领着我们参观学校。但见校园围墙内侧又有一条红色大标语:“鼓足干劲,力争上游,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!”这些字我都已认识,因为大街上到处都有。环顾四周,整个校园十分简陋:几幢低矮的平房坐落在围墙内的树林旁,北围墙边有一个建筑工地正在造房;西南面的操场上有两个用来跳远和跳高的沙坑,沙坑旁有一架双杠,还矗立着一个包括单杠、吊环、软梯和滑梯的“联合器械”。这便是广化小学当时的全部校舍设施了。

来到校园东边的一幢老旧平房前,姐姐指着一间旧屋说:这就是一年级的教室。走进一看,一排排长木板搁在用石块垒砌的墩子上,右当课桌。课桌间并没有凳子,姐姐说上学要自带小板凳的。讲台后面墙上挂着

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广化小学。

一块大黑板,黑板上方贴着毛主席像,两边有八个大字:“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”。另一头墙上贴着一些少年儿童认真看书的图画。教室四周的墙壁粉刷层多有脱落,可见斑驳的灰砖。左右两边分别有两个木框小窗户,室内光线比较暗淡,人字梁上吊着几盏白炽灯泡。屋顶椽子间的网砖有的已经掉落,可以看到灰黑色的鱼鳞瓦,甚至有亮光从瓦缝里射进来,祖母说下雨时可能会漏水。果然有一天,外面下大雨,教室里下小雨,把很多同学的书本都淋湿了。这是后话。

开学第一天,清风拂面,阳光灿烂。我背着妈妈缝制的“土书包”,包里装着一个铅笔盒,内有两支铅笔、一把削铅笔小刀、一根“米达尺”(短直尺)和一块橡皮,拎着小板凳,和姐姐及几个邻居小伙伴,结伴走向学校。到了教室门前,老师让我们按个子高矮排队,从小个子开始拎着小板凳进教室顺排而坐,座位分配好后就发新书。

那时的小学语文课本充满着爱国主义的红色正能量。第一课就是“毛主席,像太阳,他比太阳更光亮……”

课文上每个字上面都标有汉语拼音。我们跟着老师先学拼音,再逐个认字;算术课就从阿拉伯数字开始学起……课间,我们在操场上追逐嬉戏;中午下课后,所有学生都回家吃饭,老师带队一直送我们走到广化街口,下午放学后亦然,根本用不着大人接送。

二年级开学时,我们搬进了暑假期间建好的三层新教学楼二楼,新教室两边都是玻璃大窗户,不仅宽敞明亮,而且桌椅齐全,再也不用自带小板凳了。体育课上,我们在操场上学习各种强身健体的锻炼方法。音乐课上,老师教我们学唱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《我们多么幸福》等歌曲,其中“我问你亲爱的伙伴,谁给我们创造了幸福的生活?”“我们感谢敬爱的毛主席,建设许多美丽的学校”等歌词,至今记忆犹新。

每逢节假日和寒暑假,我们响应国家号召,按照学校的要求,积极投入以“除四害”(苍蝇、蚊子、老鼠、蟑螂+臭虫)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中。我们把拍到或抓到的害虫和剪刀下的老鼠尾巴,都用纸包起来,带到学校统一焚毁。在课余时间到处捡拾废

铜烂铁和破碎的陶瓷水缸片,以支援大炼钢铁。夏秋两季,老师带我们来郊外,在菜地里捉害虫,或者拾捡麦穗、稻穗交给生产队。

1961年暑假期间,在位于怀德路上常柴厂隔壁的热工仪表厂工作的父亲,为了照顾一位家住清凉新村徒步上班太远的同事,就把横兴弄里的租房和该同事对调,我家就搬到了当时南郊的清凉新村,我姐弟俩便转学到位于清凉寺的德安小学继续读书。

尽管我在广化小学只读了两年书,但在那里受到了文化知识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,加入了少先队,也迈开了社会实践的第一步。一眨眼65年过去了,可是我始终忘不了这所始建于1908年的百年老校,在史志研究中还了解到,从1975年到2002年,她先后兼并了建新路小学、东下塘小学、中心桥小学、史家弄小学、马园巷小学等,如今已成为觅渡教育集团的骨干学校。

广化小学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母校,是此生读好“三书”(学历之书、职业之书、社会之书)的出发点。我想走进去看看,但因现在的保安之阻而无法实现,只能站在对面远远地、深情地眺望。

凡人剪影
张国康

母亲的工会会员证



我母亲的各种红本本

母亲离开我们后不久,老家的房子被征收开发。在向开发商移交房屋前,我带走了一些母亲的物品,其中有一个用花手绢包着的东西,她在世时我们都没有认真看过。

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小包,展现在我眼前的是几个红本本,里面有母亲当年在工厂的职工工作证、操作证、参加工会的会员证,还有她的退休证。看得出来,我的母亲非常爱惜这几个证件,几十年一直保管在自己身边。

我的母亲1920年出生在金坛农村,那时的农村非常贫苦。母亲有四个弟弟,自己是独女。在她十多岁时,父亲托人介绍到常州城南农村当童养媳,后来就是我的母亲了。那时,我的爷爷家有脚踏织布机,我的父亲在家织布,母亲纺纱。1936年的一天,听到离家不远的德安桥旁的大成一厂招工,俩人前往应聘并同时被录用进厂。解放后,我的父亲被调到无锡回忆布厂,由于工作出色,还入了党,当了生产科长。我的母亲为了支援丹阳发展纺织,去了丹阳棉纺织厂。

我在常州市总工会工作三十多年,对工会有深厚的感情。最近,我又一次翻看母亲的工会证。我的母亲是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五天,即1949年10月5日成为工会会员的,那时母亲已经工作了十多年。母亲曾跟我讲过,当厂工会主席通知她被批准加入工会组织的那天,母亲兴奋得一个晚上都没睡好。

在母亲知道我从工厂调到市总工会工作时,她深情地给我讲,她们那时候,作为普通纺织女工,只知道工会是娘家人,有什么话总想找工会干部讲,工会布置什么事总是认认真真做。

母亲记忆最深的是,在毛主席发出“打过长江去,解放全中国”的号召,江南迎接解放时,厂工会也发出号召,保卫厂厂迎解放,要成立护厂队,母亲积极报名。当时厂内确实也有少数不明真相的人,受坏人的鼓动,企图破坏工厂设备。我的母亲和许多护厂积极分子,不分白天黑夜,值班巡逻,保证工厂完好迎接解放。

解放后,我的母亲在工厂恢复正常生产的过程中,和工友们

一起加班加点,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。因为那时她是厂里最早的工会会员,年轻但没文化,厂工会安排我母亲参加了厂里第一期扫盲班,在那里学到了一些文化知识,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。母亲在扫盲班学到的东西,后来在生产中用上了,在日常生活中也用上了。我和我哥分别在1968年、1969年应征入伍,经常给家里写信,报告在部队的训练和生活,母亲总是有信必回。

在解放初期,我的母亲总觉得自己是工会会员,就应该是企业的主人,于是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生产中去了。为了自己安心生产,把我和哥哥幼小时就送到金坛外婆家,把姐姐交给我的爷爷,自己一心在工厂。她还跟我说过,那时,厂工会还推荐她参加过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。

我的母亲是老工会会员,对工会有感情,我在岗位时,只要回家探望她,她总是要提醒我要做好工会工作,不要辜负党的培养。我有时还嫌她话多唠叨,现在想想,母亲对工会的确是有很深的感情的。

流年碎影
丁吉林

乘风凉

现在的夏天,外出乘风凉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夏天的晚上,呆在家里,吹着空调,喝着热茶,看电视或玩手机,真是惬意。

我小时候怕过夏天,只有到傍晚才能享受短暂的快乐。吃完晚饭,家家户户都会到家门口乘风凉,父亲总是早早地在门口把门板铺好,用凉水浇一浇周边的地面,然后人手一把芭蕉扇,或坐在自家门口,或去邻居家串门唠嗑。那时乘风凉活动很多,路灯下早给打牌的人占领了,拉胡琴的、讲故事的、吹牛侃大山的,东一簇西一簇的,还有的辛苦了一天直接在门板上睡觉了。

我从小喜欢听故事,所以哪里有什么故事的就往哪里钻。我家隔壁吴家大妈最会讲故事,她是个戏迷,只要有空,她就会把自己看过的戏——讲给我们听,“狸猫换太子”“董永与七仙女”“红楼梦”“追鱼”等等,我真的是百听不厌。一天晚上我正无聊地摇着芭蕉扇,一小同学路过我家门口随口对我说:“今晚周家巷有露天电影。”我转身对着父母大喊一声“我去看电影啦”,就和小同伴往周家巷(现在的建材新村处)走去。我记得那天看的电影是《烈火中永生》。又有一次,我正百无聊赖地躺在门板上,一阵阵锣鼓声由远而近地往我家这边传来,赶紧跑去看热闹,只见二十几个男女青年组成的文艺宣传队边走边表演,我和几个小伙伴就一路跟着宣传队走到了钱家村。原来是钱家村大队(现锦绣菜场处)邀请宣传队来村里文艺演出的。他们先唱了几首革命歌曲,然后说相声、快板、三句半,最后还唱了几段现代京剧,演出一直到凌晨一点钟才结束。这么晚回家,自然是给父母教育一番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家买了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,从此,我家门口成了乘风凉的主战场。一到晚上,父亲就叫我们一起去八仙桌抬到门外,然后把电视机摆在台子上,左邻右舍们就会搬着椅子围拢过来,有时路过的行人也被电视内容吸引着停下脚步。

今年的夏天,似乎比那时候的夏天闷热了很多,白天懒得出门的我,傍晚总想着到楼下活动一下手脚,这个时候,脑子里就会像放电影似地回忆小时候一幕幕。